

明末清初诗论研究

孙立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目 录

序说	(1)
一、研究明末清初诗论的初衷与意义	(1)
二、研究的范围、材料及方法	(3)
三、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6)
第一章 竟陵诗说的新变及对古学的兼综	
.....	(9)
第一节 钟、谭其人	(9)
一、可怜生前身后名	(9)
二、不合流俗与不为流俗接纳	(15)
三、还是一个读书人	(18)
第二节 综合与求新	
——竟陵之文学史观	(23)
一、趣兼七子、公安	(23)
二、削名与迹，诗求独响	(25)
第三节 真诗与幽情单绪	
——竟陵之诗歌创作观	(29)
一、关于“幽情单绪”	(29)
二、真诗的提出	(31)

0126 22

三、真诗：续接古今真精神	(33)
第四节 纤仄与柔厚	
——竟陵之诗美观	(40)
一、冥心放怀，期在必厚	(40)
二、厚：以灵与学为基础	(44)
三、竟陵诗说：理论与实践的偏离	(46)
第五节 余论：为竟陵诗说定位	(48)
附集评	(53)
第二章 晚明社事与文社诸子的兴复古学	
.....	(66)
第一节 文社的缘起与运作	(66)
一、由诗社到文社	(66)
二、组织与运作	(73)
三、文社的选文	(78)
第二节 文社的文学活动	(80)
一、文社的制艺	(80)
二、文社的诗文创作	(82)
第三节 古典主义的信奉者	
——几社陈子龙的诗文理论	(84)
一、生平与几社的活动	(85)
二、趣归古典	(91)
三、本乎志，遇乎时	(95)

四、雅正与法度	(98)
第四节 八股名家 选文好手	
——艾南英及其八股文论	(101)
一、艾南英的社事活动	(101)
二、排击七子 痛诋公安	(104)
三、由唐宋文以臻秦汉文	(108)
四、以古文济时文	(111)
第五节 余论：文社诸子的古典主义倾向	(118)
附集评	(120)
第三章 方外遗民对古典诗说的尊崇与游离	
——以方以智、傅山为对象	(127)
第一节 明清之际遗民思想家的文学游历	(127)
一、遗民思想家与文社活动	(128)
二、方、傅与其他文人的交往	(132)
第二节 方外大儒 诗文尚古	
——方以智诗文理论平议	(136)
一、由泽园公子到方外大儒	(136)
二、文章论	(140)
(甲) 文章与道艺	(140)
(乙) 古文史观	(143)
(丙) 文多奇变 雅驯为上	(147)
三、诗论	(150)

(甲) 对明诗的反省	(150)
(乙) 论诗的格调声律	(152)
(丙) 诗的兴感怀抱	(155)
第三节 自命异端 三晋大儒	
——傅山的生平及诗文理论	(157)
一、文人、寒士、遗民	(157)
二、东南之文与西北之文	(160)
三、山林野气之文	(164)
四、儒学异端	(169)
第四节 余论：方、傅异同论	(175)
附集评	(177)
第四章 王船山古典主义诗学的建构	(181)
第一节 山中大儒与民族志士	(181)
第二节 推故而别致其新	
——王船山对旧诗论的清理	(185)
第三节 情与景	
——王船山的诗境论	(189)
一、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	(189)
二、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192)
三、参化工之妙	(194)

第四节 船山与庄子

——王船山的诗歌创作论 (196)

一、天籁与人籁 (196)

二、物我为一和情景交融 (202)

第五节 “兴”

——一个有关诗歌鉴赏的命题 (208)

一、兴：作品与读者 (208)

二、兴与兴观群怨 (209)

三、兴在审美鉴赏中的意义 (211)

四、兴：由独思到众感 (215)

五、兴的限定性 (217)

第六节 巨人与侏儒

——王船山文学批评中的封建伦理观念 (219)

一、重兴群与轻观怨 (219)

二、理欲性情的规范与诗的理性情感 (224)

三、仍是儒家传统诗教的继承者 (228)

第七节 余论：不以门派论是非 且辨源流求真诗 (230)

附集评 (233)

第五章 明代复古主义的终结与清诗的开山

——以钱谦益为对象 (238)

第一节 政坛失意者 文苑一宗师 (238)

一、书生式的政客 (239)

二、文苑宗师	(242)
第二节 钱谦益的诗论背景及理论来源	(246)
一、钱谦益与袁中道	(247)
二、钱谦益与钟惺、谭元春	(250)
三、钱谦益与程嘉燧	(256)
第三节 《列朝诗集》——一部明诗的备忘录	(257)
一、论选诗之标准	(259)
二、品诗重知人论世	(261)
三、重地域及师承	(262)
四、诗不当割时代为鸿沟	(267)
五、一部小品式的学术传略	(268)
第四节 从《初学》到《有学》 ——钱谦益诗论要旨	(269)
一、老调重弹也风靡	(269)
二、诗乃不得已而为之	(272)
三、诗乃天地间之元气	(274)
四、取径于眉山剑南之间	(278)
五、钱谦益后期诗论之新变	(282)
(甲) 提倡诗的温厚之旨	(282)
(乙) 逃禅与以禅说诗	(284)
(丙) 诗人之诗与儒者之诗	(287)
第五节 余论：钱谦益的诗友门生及其承传与分化	(291)
一、钱谦益与虞山诗人	(292)
二、钱谦益与宗宋一派	(297)

三、钱谦益与王士禛	(302)
四、小结	(306)
附集评	(308)
附录一：明末清初诗论家文学活动年表辑录	(312)
附录二：主要征引书目	(364)
后记	(371)

序说

一、研究明末清初诗论的初衷与意义

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明末清初的诗论地位并不为高，没有产生太多的文学批评巨著和文学批评大家。如果说贯穿于明代二百余年的复古与性灵之争为一座山峰，清代诗说百家纷呈的局面是另一座山峰的话，明末清初的诗论就恰如这两座高峰中间的低谷。

但若就明清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而言，明末清初这一低谷既是对明代诗说的反刍，也是对清代诗说开创新局的奠基。所以说，低潮期的文学批评往往包容着对前一个文学批评高峰的反思和总结，其中批评家对前人的汲取或攻讦，对各种理论的咀嚼和兼综，往往能给我们一种启发和思路；同时，在低潮中又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批评家对未来出路的探寻和思索，在旧有的基础上对前人理论的重申或改头换面，又往往与此后另一个诗论高峰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低潮期诗论的现状，可以看出前期诗论的利弊，了解由低谷向高峰演化的过程和理论的衔接。我所感兴趣的，就是清人如何从明人的宗唐还是宗宋、复古还是性灵这种非此即彼的圈子中钻出来，转向对诗体的形式和艺术特征的关注，从而提出诸如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等各具理论特征，且至今我们仍耳熟能详的诗说。

具体来说，研究此期诗论的现状与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通过此期诗论家的言论，可以了解唐宋以至元明时期诗歌创作及诗论的基本情况，作为治诗歌史及诗论史的一个参照。虽说清人屡屡批评明人空疏不学，但明人对诗歌艺术方面所下的功夫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诗体及在诗史方面所发表的意见，可以通过明末清初诗论家对他们的研究批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其二，此期的批评家大多体现出了一折衷综合的学术态度，其中尽管也有偏激者，但在对明代各家诗说批评的同时，实际上也暗有所取。比如竟陵派在提倡幽情单绪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汲古倾向；王夫之虽对七子大加挹鲁，但他对七子的宗唐还是间有所取，并没有因反七子而滑向宗宋；最典型的是钱谦益，他虽然没有更多新的理论提出，但他能兼综各家，对一些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予以重申，实际上成为一个集成者。这种倾向，在此期的不少批评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对于我们了解清人的学风和以综合见长的诗论有所帮助。

清代无论是各体文学的创作，还是诗论，均呈现出一种繁荣的局面。它们虽然相比唐宋以前而显得缺乏独创性，但综合之功也颇堪称道。梁启超在论到清代学术时说：“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的学术，倒卷而演绎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代奇异之现象也。”（《清代学术概论序》）梁的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清代学术善于综合及善于借鉴前人，从而愈来愈接近前人精华的特点。清人的这一学术特点，应该说渐萌于明末清初。

其三，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期，剧变的时期对诗论有何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时代变动之中诗论的现状与转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这一类文学乃至文化现象的

一个典型。事实上，在时代剧变时期，诗论界盛行的保守的古典主义风气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此外，清中期以后的诗论界虽然新说迭出，但若就师承交游来说，清初钱谦益、黄宗羲对清中期以后诗坛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欲了解清中期以后诗论的发展，亦当从清初各家的师承交游追根寻源。

二、研究的范围、材料及方法

本书所撰论的范围，从朝代而言，为明末清初；从纪年而言，为17世纪初年到17世纪末期，跨越近一百年的时间。如何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选择有代表性的诗论家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

我选择竟陵派作为第一个论述的对象，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学界一般将竟陵作为公安的余绪来对待，而我则将之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来处理。竟陵派作为公安派派生出来的一个流派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从其师承及理论的由来都是如此。但钟惺、谭元春此后与袁中道的分歧，对公安派俚俗的修正，对七子诗说的兼取，都透露出一些新的信息，即由竟陵派开始，对弘治以来两大派系的论争出现了一个综合的倾向。钟惺、谭元春对古学的重视和提倡，又是此后古典主义潮流泛起的一个征兆。因此，竟陵派不只是公安的余绪，从其发展的趋势来看，它与其后各家诗说呈现出的综合折衷的学术眼光及对古学的兴趣，有着理论与方法的关联。此外，由于竟陵派是一个中间的过渡性派别，所以夹生的理论与进退失据的状态，使后世不少诗论家对其存有一定的误解或偏见，因此我在论述的过程中，也做了一些辩诬的工作。

中间数章，分别选择了文社诸子、明末方外遗民、王船山诸家。我选择他们作为对象，是基于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在当时广有影响者；二是在当时富有特色者；三是虽没有影响但价值巨大

者；四是价值不一定大却广有影响者。以此来衡量，文社诸子属广有影响一类；方外遗民属富有特色一类；王船山属没有影响但价值巨大者。通过他们，可以看出此期诗论多个层面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此期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本书未列出专门的章节，一是黄宗羲，考虑到他在许多问题上与钱谦益有相类的看法，所以将他的诗论散入钱谦益及王船山的部分中去写；二是纂辑《诗源辩体》的许学夷，许的这部书体系庞大，共计三十八卷，分论先秦至明代之诗，而以唐为宗。其论诗虽也有折衷七子、公安、竟陵的倾向，但持论总以七子为正。由于《诗源辩体》一书的写作虽前后历时四十年，但其草创则始于公安尚未兴起的后七子影响的时期，书中有晚明时期的内容，也有稍前万历年间的思想，所以并未能完全代表明末清初的诗论倾向。另从总的倾向来说，许的看法以七子为宗，与文社诸子中的陈子龙较为接近，由于篇幅的原因，只好割舍。

最后我以钱谦益作为此期诗论的殿军，钱属于那种理论本身的价值不一定大但却广有影响的人，虽然在本书所选择论述的人物中，他的出道及去世均较早，但若就影响而言，他人无能出其右者。我选择钱作为殿军，还有一层理由，钱的理论虽没有多少创见，但在他手上，明代各种显赫的诗派销声匿迹，成为终结。同时，他又善于综合，在批驳清理前人诗论的同时，通过解析、引述或重申，扯出多个诗论的话题，就好像一个准备各色半成品拼盘的师傅，虽然没有在自己手上成就出精致的菜式，但为后来的师傅进行了前期的准备。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探讨了钱谦益对他同时及稍后的诗论家所产生的影响。

本书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常用的文人别集、诗话、书信、序跋、选本中的批语外，也注意采取方志及文人年谱中的有关材料。前者可以使我们了解理论，后者有助于掌握人物交游、师承关系及理论的背景，一些过去人们较为忽略的问题可以从中找到

线索。比如从《宝庆府志》了解到王船山与方以智结识的具体时间，有助于体会两个古典主义者何以“相善”的缘由；钱谦益《晚年家乘文》记载了钱在幼年时期受祖母庭训的情形，有助于我们理解钱降清与反悔的心态；在陈子龙《自撰年谱》中，记载了他与艾南英论战杯葛的情形，可以与其他文献相校正；通过《石门县志》，可以了解吴之振与黄宗羲、吕留良等人编纂《宋诗钞》的情形，文中对其诗说取径的记录，也是珍贵的诗论资料。此外，将年谱年表一类的资料与诗论家自己的书信序跋相结合，可以知道钱谦益与袁中道、钟惺、谭元春之间复杂的关系，对于了解他们诗论的源流变迁也有一些好处。古人讲交友论诗要知人论世，我们对诗论家及其诗说的了解，当也不能离乎此。还有，历代的书目提要，往往注意指出撰者的学术观点，勾勒派别及源流，也是笔者所注意采取者。

采用何种体例及方法去展示此期的诗论是一个烦难。采用专题分类的形式，虽能使某些线索更为清晰，但不易窥见全貌，也不易深入。采用史的形式，便需要网罗尽可能多的人物和资料，包括主要的、次要的，还要确定具体章节来涉及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乃至文学创作的背景，再在体例上显示出历史的演进，使之不要成为专家专论的一般集合等等。这虽然是一个更好的体例，但限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目前还难以做到这样的程度。再就此期诗论的具体情况看，历史演进的痕迹并非十分清晰，也不富于波澜壮阔之势，若以史的形式去写，惟恐自己的主观意图太多地渗入，如此一来，虽然勉强成其为史的形态，又恐弄巧成拙。

所以，我仍采用最传统的专论形式，以某家某派或某几个相近的人物为专论的对象，从所论对象的生平思想、师承交游入手，进而分论其诗论体系，再勾勒其前后影响及承传关系，虽不以史为目，但力争于论中见史，于个体中见整体，使所探讨的问

题能够较为深入，并试图显示出此期诗论在批评史中演进的轨迹和位置。

三、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对此期诗论的研究，除解析基本理论外，我将思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诗论家本人的生平与学术倾向。如何知人论世，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路之一，也是我思考与写作中一直萦绕在脑际的问题。举例来说，钟惺在入清以后，一直被像钱谦益、朱彝尊一类的人物所批评，批评的话头之一是钟空疏不学。但依据史料及钟本人的撰述，他并非不读书之人。但与钱、朱等人的学术思路是不一样的，钟在史书及子书甚至内典上用过功，对经书则确实没下过功夫。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钱、朱还有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对其“不学”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其不学经书。

二是关注诗论家的师承与交游。中国文学批评史，不仅仅是理论的演进史，同时也是诗论家的师承与交游史，不了解师承与交游，不仅理论本身显得单薄，而且不易看出理论演进的背景和内在原因。比如王士禛中年的宗宋，与结识钱谦益有很大的关系；冯班的宗晚唐，与钱谦益自然有很大不同，但冯对钱氏的批评严沧浪却多有汲取，这也是他们师徒间所留下的纪念；再如傅山作为三晋西北之地的学者，他对东南之文及东南士子的不满，与他久居僻地，又少与东南士子相交并缺乏沟通有一定关系。诸如此类的师承与交游，有时会有助于解决理论上的问题。

三是关注史的线索。中国学术于史学素有偏胜，除专门的史书外，其他不属史书体制的著述，也常有史料的价值，如诗史、野史（实际上一部分是稗官杂说笔记中所出现之史料），还有些书目提要、年谱、年表、家乘文、谱牒、方志、碑传、墓志一类的著述，也往往成为史学的一部分。在诗学中，有一种附列于诗

集文集前的人物小传，以诗（文）系人，以人系传，往往能够在传论中勾勒出其渊源流派，也体现出一种史的意识。我于这种体例受到启发，如能在各个不同的传论中勾出其渊源所自、流派所趋，同样可以达到追根溯源的史学目的。

在明末清初这段时期的诗论发展中，虽说史的演进迹象并不明显，但也并非停滞不前。在印书业和传播渠道已较发达、文人的交往也日渐频密的这一时期，学术的共同话语远较以前多。此时，在流行话语之外所出现的个别话语，往往值得注意，因为它可能是下一个流行话语出现的苗头；如若这一苗头渐次成为新的流行话语之后，就标志着一种思潮的来临；而当这一新的流行话语达到一定的热度后，又生成出新的话题，它又会成为下一个话语的苗头。明末清初的近一百年间，诗论的演进即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在公安派处于盛而将衰之际，竟陵派提出了幽情单绪，也提出了读古人诗的话题，其后幽情单绪没有传继下来，但学古的问题却成为诗论界的热门。此后文社诸子中的陈子龙、张溥、艾南英、方外遗民中的方以智、王夫之乃至本书未论及的其他一些文人都讨论过学古的问题，显示出古典主义成为一轮思潮。但在古典主义思潮兴盛之际，也有一些文人对此并不热衷，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些话题，比如钱谦益对严羽的批评，钱谦益与黄宗羲、吴之振等人的宗宋，钱、黄提出的学人或儒者之诗，均成为古典主义思潮落幕之后新的诗论话题。因此，此期的诗论在低谷的反思与咀嚼中，史的演进也还有迹可寻。

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单个的传论中体现出这一线索。这一线索本是由各个诗论家的诗论中综合而出的，但又融在各个诗论家的专论之中，并没有专门标出。我的想法是，仍旧立足于专论，先不强求将每位诗论家都纳入史的线索。因为诗论本身的发展并不完全像人的主观所总结的那样是有序的，或是有规律的，它有时可能是杂乱的，无规律的。在这种情况下，以专论的形式尽可

能客观地展示其原生形态，也许能避免主观的介入。我只在每章的结尾或行文的某个地方，参考古代诗文小传的做法，将渊源流派予以扼要指出，以显示出这一线索。

此期的诗论，有些前人有较多的讨论，如竟陵派与王夫之。对这些学界有较多研究的诗论家，我力争能有些更深入的剖析或是增加别人讨论过但不够准确或仍显薄弱的地方。有些是别的学者有所涉猎，但还不够充分全面者，如钱谦益；另外像文社诸子陈子龙、艾南英，还有遗民思想家方以智、傅山等，专文的研究文章很少，在几种批评史著作中，限于体例，或没有提及，或一笔带过。我想做的，旨在补苴罅漏，能在前贤基础上有所增益，足矣。

第一章 竟陵诗说的新变及对古学的兼综

第一节 钟、谭其人

一、可怜生前身后名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里在今湖北省天门皂市附近。钟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神宗时授行人，后改工部主事，又以南礼部代制司主事，再升福建提学金事，督学于闽。天启三年癸亥大计，因受党争牵连，中计，遂服阙不起。早年与谭元春合编《诗归》一书，分《古诗归》与《唐诗归》两部，风行海内达三十余年。《诗归》外，今另有《隐秀轩集》、《周文归》、《西汉文归》、《史怀》等十几种著作传世。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与钟惺同为竟陵人，故里在今湖北省天门县城南。谭早慧，但科举及仕途均不得意，早年跟随钟惺左右，钟惺去世后的天启七年，他才举于乡。崇祯十年丁丑会试，歿于旅途。据《府志·谭友夏传》：“崇祯丁丑会试，（元春）行至长辛店，去京三十里，时夜半犹读《左传》。平明起，摄衣一响而逝，年五十二。”有《谭友夏合集》传世。